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

---

出版发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数	0,001—1,500 册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19.875
版 本	1995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39-111-9/K·9		
定 价	22.60 元		

---

## 出版说明

为弘扬中华文化,传播社会科学名家的优秀学术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研究,我社编辑出版著名专家学者《学术论著自选集丛书》。每种均由作者自选、自序、自传。本书即该丛书的一种。

此项工作难度较大。限于我们的水平,工作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自序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优秀学术成果，要给我出一本学术论著自选集。我感到很惶恐。虽然六十年来写了一些东西，是否堪称优秀二字，殊无自信。但是，从文化学术的发展来看，这些论著多少代表一个时期一些方面的成就，在历史上留下若干痕迹，可为以后研究我国二十世纪文化学术的人提供点滴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我答应了选印这本集子。

从内容看，这本自选集是比较杂的。它涉及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敦煌学、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几个方面。这要从我的个人兴趣、早年训练和四十年来所接受的任务来说明。

我在私塾读书十年，受益最深的塾师是

24岁来我家的张曾敷之子张潞雪先生。我从他学写古文，接触清儒朴学，在考据方面有所薰染。同时也在家塾学了日文和英文。日文教师是京都帝大国文学科毕业、清未来保定任教习而留在中国的牧野田彦松先生。我在北京先后读过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一年）和辅仁（一年）、燕京（本科三年、研究院一年）两校的历史系。在燕京受邓之诚先生和洪煊莲先生影响较深。魏晋南北朝史的兴趣是由邓先生断代史课培养的，而洪先生的两门（初级与高级）史学方法课给了我治史严格训练。在清华“偷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之后，眼前放一异彩。经陈先生推荐，我进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从此这段历史成为我主要研究范围。在史事之外，还留心史料中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晋宋书故》的未竟之业。

回顾我在这个领域的论著，当从事于此的学人还不多的三、四十年代，我提出了某些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但选题多凭一时兴之所至，对这段历史缺乏全面整体的看法，也没有各个击破、逐步深入的研究计划。五、

六、七十年代由于其他任务和“史无前例”的大动乱,这方面的研究长期搁置起来。“科学的春天”来临以后,我重理旧业,首先温习一遍有关史料——《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在此过程中虽有所论述,往往止于东鳞西爪的一得之见,仅能在此领域添砖加瓦而已了。

三十年代末,母校燕京大学推荐我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东亚语言文化系)学习。燕京给我的任务是研究日本语言文学。我深深服膺陈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学术道路应先具备他的条件,亦以到哈佛有机会学习梵文而私喜。在哈佛主要受教于叶理绥先生和柯拉克先生。叶理绥先生俄裔法籍,是明治年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个在国文学科毕业的外国人,以后被誉为“西方日本学之父”。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竺门的弟子,兴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导学生通读《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为教材。我这本集子中关于佛教史和梵文的论述,就是在哈佛学习的结果。哈佛毕业的博士论文《唐

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包括天竺密教三位大师汉文传记的英译，因是第一手资料，对西方佛教史学界颇有裨益。但进入五十年代以后，时移世异，在客观环境的不许可与主观思想的片面性情况之下，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佛教史就从此束之高阁了。

先父叔弢先生是著名藏书家和文物鉴赏家，我从小有机会接触敦煌写经。得闻陈寅恪先生“预流”之说后，认识到“敦煌学”的重要意义，也就所能见到的卷子作一些考订。八十年代，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分配给我研究敦煌写本书仪的任务，作了初步探讨。这是选集中收有“敦煌学”文字的原由。

我十来岁时喜欢读一些明治以来日本文学作品。为纪念先师张先生，翻译过秋田雨雀的名作《先生之墓》。大学毕业的论文以《大日本史》为题。但只是到哈佛大学后，接触到汉和图书馆丰富的日文藏书，又得叶理绥先生的指引，才对日本古典文史有进一步了解，1946年回国后，除在大学教日文的职



业之外，还须在外面兼课才能糊口。当时的北平没有人教日本史，燕京、清华、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课，竟由我一人承乏包办。五十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必修课亚洲史，建立亚洲史教研室，提出要我负责。我认为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承担下来。我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而自己亚洲史领域的研究仍在日本史。当年时势所趋，搞了明治维新前后。八十年代中期退休以后，才着手于自己感兴趣的江户时期。这就是自选集中日本史方面论著涉及两个不同时期的原故。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报刊上常需要发表回顾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的文章，这个任务往往落在我身上。这些为现实服务的文字以外，我就所知较多的中日文化交流写过一些东西，也反映在自选集中。

我的研究工作主流在历史。六十年来，我可说是经历了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不同阶段的训练。我今

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以上所说，似乎陈义甚高，却又像老生常谈。我自己则心向往焉，而愧弗能也。

是为序。

1992年8月9日写完

## 目 录

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1
乞活考	13
——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	32
《世说新语》札记	40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 官位及清浊	46
论梁武帝及其时代	71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	104
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	173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190
论宇文周之种族	214
魏收之史学	231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270
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290
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	304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314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九条)	320

设主人	326
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	328
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	335
刘彧与方镇及大臣诏书中当时口语	337
觉	342
南朝东南内地之位置	344
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	348
崔浩国史之狱	358
事	367
魏晋南北朝词语小记	372
*          *          *	
《车子理惑论》时代考	383
能仁与仁祠	406
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	417
论佛典翻译文学	424
中国的梵文研究	434
*          *          *	
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	451
“赐无畏”及其他(增订稿)	476
——读《敦煌变文集》札记	
说宛	492
*          *          *	
新井白石论	499
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	521
*          *          *	
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	552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译问题	559

---

中日文化的异与同	564
从中秋节看中日文化交流	568
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	576
——一种文化比较	
新井白石	582
——中日文化交流的身体力行者	
罗卧云——中日文化关系史上不应 遗忘的人物	595
* * *	
读《吴虞集》后所想到的	603
我的《我的前半生》	608
自传	617
主要著作目录	623

## 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清代钱仪吉排比贯串晋书里关于兵制的材料，作《补晋兵志》。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有些材料只是笼统地抄下来，不曾仔细考察，所以读后印象依然模糊不清。又有些问题势必追溯到曹魏时代的情形，来龙去脉才能清楚，而钱氏也未能作到。这篇文章就是想讨论钱氏征引了材料而未加分析的曹魏西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日本滨口重国氏有《后汉末曹操时代之兵民分离》（一九四〇年东京东方学报第一一册之一）和“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分”（一九四一年史学杂志第五二编第三号）两文，讨论曹魏时代自成户籍不属郡县的兵户，以及两晋南朝沿袭此制的状况。何兹全先生在他的《魏晋南朝的兵制》（一九四七年历史语言所集刊一六本）文中，有“世兵制”一节，所论尤为详赡。但在兵制的运用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晋书》四六刘颂传：

颂在〔淮南〕郡上疏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当即羊祜传所言徐扬青兖荆豫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今得长王以临其国（谓江东），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

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从役户居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后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温公《通鉴》八二系此事于太康十年，撮要叙述刘颂奏疏之后，结以“帝皆不能用”。不过上文所引一段奏疏，《通鉴》却只字未提。这段主旨实是攻击曹魏时代的一种弊政，西晋沿而未革者。它的原则就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而其施行则见于兵役和力役制度。换言之，就是服兵役和力役的人都不在他自己室家所在，而是到别的地方去服役。所以刘颂主张改革，应该“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

力役之遵照这种原则者，似乎就是所谓“错役”。“错”是“交错”“间错”之意。《三国志》——胡昭传：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

建安二十三年夏刘备屯阳平关，打算进攻汉中。七月曹操自将击备。调陆浑丁夫即是此时。言“丁夫”当是指供军中劳役，而非去充斗兵。董卓死后李傕郭汜相争，《魏志》六董卓传说三辅地方因为“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参看《魏志》—武帝纪建安四年注引《魏略》。）再经韩遂马超等诸将之乱，关中更加残破。《魏志》—五张既传说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中，“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又载“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所以不从关中调丁夫是可以了解的。但不就汉中一带本地征调，却远从陆浑调人服役，也许就是所谓“错役”制么？这种“错役”如果地方相距不远，或者不至于出问题。陆浑和汉中相去太远，于是百姓就“恶惮远役，并怀撓撓”了！

《三国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王〕哀门人为本县所役，……乃步担乾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哀乃下道，至土牛，馨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晋书》八八王哀传文略同，当即本王隐书。）

王哀营陵（今山东昌乐县）人，县境和安邱毗连，所以安邱门生可以到营陵去受业。王哀到安邱县，而言“送别”，可见门生将离开两县县境去服役，故用“送”字也。

军人原不能限制服役于自己的乡土，是要看攻战和防守的需要而定他们驻屯的地方。两汉时代地方有兵，同时也要到中央番上。建安以后曹操执政，有一种现象，就是兵士须和他的室家所在的地方隔开。据刘頌上奏，这并非偶然的现象，竟是曹操有意的措施了。



《吴志》七诸葛瑾传载孙权对瑾说：

〔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

三国时代相互交兵，本是诈伪假满不择手段的，离间之计更不足为奇。但看曹操一生，只有对韩遂马超是用了反间计，他们并非骨肉。袁谭袁尚兄弟阋墙，虽因此而为曹操利用，但曹操并未离间他们，当然谈不到酷字。我认为这里的“离间”不是抽象字样，而是指空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兵士和室家的隔离。孙权泛论曹操的为人与政策，这样解释才和上下文“杀伐”“御将”相应。

新降附于曹魏的敌军往往被调遣到他们原据地区之外，如《魏志》一七徐晃传注引《魏书》：

〔建安九年〕太祖既平冀州，遣〔朱〕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数乘宽缓，暂见齐整，意尚快快”。

《魏志》二三赵俨传：

〔建安十六年〕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以俨为关中护军。……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东兵寻至，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平诸葛诞后，吴兵降者万余。议者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魏志》二八诞传）。司马昭“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用意相同。

如果不徙兵士，就把他们的家口遣送到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如《魏志》一五梁习传：